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三十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山西方志简史

刘益龄
著

山西方志是三晋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,它经历了孕育萌生、发展成型、勃兴鼎盛、转型等过程,具有历史悠久、绵延不绝;卷帙浩繁、种类齐全;内容丰富、价值珍贵等特点。

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栋

复 审:张静华

终 审:严果生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30辑)

山西方志简史

刘益龄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5 字数:300千字

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978-7-900454-17-1

G·132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璧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钟声扬	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
郭双威	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
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
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汉魏南北朝山西方志的萌生	(3)
二、隋唐宋元山西方志的发展与成型	(6)
三、明代山西方志的勃兴	(16)
四、清代山西方志的鼎盛	(27)
五、民国时期山西方志的转型	(38)

引 子

山西历史源远流长,文化底蕴博大精深,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三晋历史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山西方志是三晋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,它经历了孕育萌生、发展成型、勃兴鼎盛、转型等过程,具有历史悠久、绵延不绝;卷帙浩繁、种类齐全;内容丰富、价值珍贵等特点。

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,山西就有了与鲁《春秋》、楚《杻杙》齐名的晋《乘》,历史上素有“文献之邦”的美誉。先秦时期的三晋文化对以后山西方志的孕育起到了滋养作用。

汉魏南北朝是山西方志的萌生时期。在经济的发展、文化的兴盛,郡县制的完善、地方豪族势力壮大等因素的促进下,褒扬郡望、彰显乡里的地记应运而生。地记是山西方志的早期形态,山西已知最早的地记是著于魏晋时期的《上党记》。

隋唐宋元是山西方志逐步发展并趋于成型的时期。其主要表现是:官修方志渐占主导,修志规模趋于扩大;方志数量大幅增加;体例名称日臻完备;志书内容更加丰富。隋唐时期,有文献可考的地记、图经共14种;宋金元时期,地记、图经、志共26种。其中,金天会年间编修的《五台县志》是山西方志史上首部以志命名的县志;唐·释慧祥所撰《古清凉

传》是山西历史上第一部山水志。

明代是山西方志的勃兴时期。这一时期,官员主持,文人参与的官修志书模式已经成熟;修志普及程度和方志总量有了空前发展;志书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有长足进步;修志理论已初显端倪。明代山西共编修了 311 种,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,现存 60 余种。

清代是山西方志的鼎盛时期。当时,志书总量远远超过明代,达 460 多种;定期修志成为制度,一般为 60 年一修,有的县份在清代修志多达 8 次;志书体例更加完善,内容更为丰富;乡土志成为一种新力量,丰富了志坛;涌现出以杨笃为代表的修志名家,他先后主纂省府县志达 15 种之多,堪称山西方志史上第一人;志书编纂水平也有较大提高,出现了被一代宗师梁启超称为佳志的光绪《山西通志》。清代山西方志编纂有两个高峰:一是康乾盛世时期,共修纂志书 206 种;二是光绪年间,共编修志书 91 种。

民国时期是山西方志的转型时期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山西方志在兴废递嬗、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下,经历着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。体例在新旧交替中实现突现;内容随时代进步更趋丰富;编纂思想受近代科技文化的影响有了明显进步;编纂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。

山西方志全面、详细地记载了我省各地的自然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的内容,对于我们了解地情、研究文化、开发经济、科学决策均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。

一、汉魏南北朝山西方志的萌生

西汉王朝建立后,动荡不安的战乱局面结束,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日益稳固,郡县制度逐渐完善,统治者为了对国家实施有效的管理,需要了解全国的版图疆域、土地、户口、赋役、物产、民情及至山川形胜、道里交通等方面的情况。当时已出现计书、郡国地志等舆地类书籍。至东汉之时,郡书、风土记、地记等记载郡国乡邦先贤、耆旧节行、风土民情的地方文献大量涌现。光武帝刘秀诏修《南阳风俗传》更极大地推动了地方郡书、地记等的编修,地记、郡书等地方文献实质上就成为以后历代方志的雏形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,地方势力进一步膨胀,地记得到了充分发展。山西方志历史的序幕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徐徐拉开。

汉魏时期山西方志萌生的社会基础。方志的产生是社会经济、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由于汉魏时期山西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,加之政治上地方豪族势力的壮大,于是,表彰郡望、宣耀门第、显示乡里的地记在山西应运而生。

西汉时期山西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,因而农业有了较大发展。当时,太原、上党、河东为主要农业经济区域。到三国时,曹操西征韩遂、马腾,“军食一仰河东”,更能说明山西农业之盛。汉魏时期山西的盐铁业驰名全国。此时山西文化经历了长期而丰厚的历史积淀之后,呈现出一派欣欣

向荣的景象。如魏晋之时太原晋阳(今太原市)人王沈曾著《魏书》44卷,为以后陈寿修《三国志》奠定了基础。东晋初期,太原中都(今山西平遥县)人孙盛著有《魏氏春秋》《晋阳秋》和《异同评》三部史著,其中《异同评》是一部较早用比较史学方法撰就的一部史评类论著。南朝宋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)人裴松之有著名的《三国志注》传世,另有《晋记》《宋元嘉起居注》《集注丧服经传》均已散佚。裴松之之子裴骃著有《史记集解》,是《史记》权威的“三家注”之一。这就为山西方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

山西有据可考最早的地方志文献当属《上党记》。此书为魏晋时期著作,南朝刘宋时裴骃《史记集解》、萧梁时期刘昭的《后汉书续志·郡国志注》、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、唐代《艺文聚类》《初学记》以及唐《元和郡县志》、宋《太平御览》均征引此书。该书约在唐、宋之际亡佚。清代学者王谟《汉魏遗书钞》辑有《上党记》部分佚文;今人刘纬毅《汉唐方志辑佚》也收有其佚文21条。从内容上看,《上党记》记载了今山西壶关、长子、垣、潞城、黎城等地及浊漳河、沁河的地理形势、建置沿革、物产等情况,文字简约凝练,但由于失传已久,其体例形式已不可考。

东晋太兴二年(319),羯人石勒建立后赵,曾命记室佐明楷、程机撰《上党国记》,但这部著作早已失传。

北魏时期,著名学者、政治家晋阳人王遵业撰有《三晋记》十卷。王遵业自幼涉略经史,曾官至司徒佐常待、著作郎,与北魏史学家崔鸿一道编撰过《起居注》。从其书名分析,《三晋记》当是山西第一部记载全省情况的方志文献。

《三晋记》曾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,但早已散佚。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征引部分文字,李裕民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、刘纬毅《汉唐方志辑佚》均收录有其佚文。

北魏至北齐期间还有《三晋山险记》一部,撰者不详。李裕民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一书从《太平御览》中辑有其佚文。

魏晋之际尚有《上党郡记》一书,李裕民认为与《上党记》“所记不同,当非一书”。刘纬毅先生则认为《上党郡记》乃《上党记》别名。

另外,北齐李公绪所撰《赵记》十三卷,虽名曰“赵”,但其内容却兼涉今山西、河北。李裕民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也将其列为山西早期方志之一,并收录佚文12条于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一书中。

据《汉唐方志辑佚》和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所载汉魏时期山西地记36条佚文分析其详细分类情况为:山峰8条,占22%;河流泉水6条,占16%;都邑7条,占17%;建置沿革4条,占11%;物产3条,占8%;言事3条,占8%;民俗风情1条,占3%;冢祠2条,占5%;土壤环境1条,占3%。文中提及的较大山峰有太行山、王屋山、鹿谷山、羊头山等,记载的较大河流有沁水、浊漳、丹水等;有名的都邑有平城、左国城、铜鞮、长平城等,著名人物有赵孝成王(战国时期)、石勒、舜弟象、白起、申生、令狐微君、羊舍等。另外,从有限的文字资料我们还可知汉魏时期的长治、晋城一带是松林茂密、植被完好、鱼肥水美的地方。

综上所述,汉魏南北朝时期山西方志有如下特征:其一,

私家撰著;其二,以山川形胜、建置沿革等地理情况为主要内容;其三,篇幅短小,文字简炼;其四,言事及人,以事系人之手法已初露端倪;其五,史料价值较高,多为后世文献征引,《后汉书》《水经注》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寰宇记》《艺文聚类》《史记集解》等传世名典中均有为数可观的引述。

由于汉魏南北朝时期造纸业尚有起步阶段,印刷术还未出现,而且当时方志多为民间私人撰著,故当时的大部分地记不可能广为流传。加之,历代天灾人祸的影响,当时的山西方志没有完整保存下一部。

二、隋唐宋元山西方志的发展与成型

隋唐宋元时期,山西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战乱与曲折,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。这一时期,山西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兴盛。与此同时,山西方志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,其主要表现是:修志规模日趋扩大,官修方志渐占主导;方志数量大幅度增加,质量明显提高;方志内容更加丰富,体例日臻完备。

(一)山西方志发展与定型的历史背景

1. 中央政府为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而倡导和组织修志

隋统一全国之前,地方政权的设置经常发生变化,行政区划既多且滥。山西处北方战略要地,是北方各王朝必争之地,因此,行政区划和建置变更也十分频繁和混杂。

行政区划的繁杂给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带来了不便。于是,从隋文帝开始,对地方政权及行政区划进行了改革与整顿。隋炀帝大业三年(607),废除了总管府之制,省并了一些州县,同时改州为郡,实行郡、县二级制。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(618)建唐伊始,就下令改郡为州,实行州、县二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。后在州县之上又增加“道”一级地方行政机构。宋代则实行路、府(州、军、监)、县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。

每一次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都伴随着大量行政区划的变更。统治者为了全面完整、准确地掌握地方情况,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有效控制,保障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的需要,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定期编纂呈报图经版籍制度。

隋大业中既曾“普诏天下诸郡,条其风俗、物产、地图,上于尚书”。(《隋书·经籍志》)这是我国由国家大规模、有组织地编修方志的开端。

唐代沿袭隋例,承续了定期编修报呈图经的制度。

当时规定,州县每隔五年须编修图经,并向中央职方员外郎报送,遇创设州县及山河改移则不受五年之限。这一制度,在战乱频仍的五代亦未间断。宋初,每逢闰年造图经上呈。宋徽宗大观元年(1107),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,与理天下州县编纂图经及报呈事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负责修志的官方机构。

中央政府编修图经的制度化以及三令五申的倡导,是这个时期山西图经、方志大量纂修的关键原因。

2. 山西经济、文化的兴盛为方志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

(1) 山西的经济状况

隋唐之时,由于山西水利事业的发展、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源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,使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。宋金之季,山西农耕技术大为发展;生产工具更趋完善;晋南一带还实行了稻麦轮作制,出现了“家给人足,仓廩有余”的局面。

隋唐至宋元,山西冶铜业、制铁业一直比较发达。盐业生产不仅产量继续扩大,而且管理也逐渐完善。宋金时代,山西印刷业也极为发达,平阳成为当时四大刻书中心之一,平阳所刻书籍称“平水版”。在农业、手工业发展和兴盛的基础上,商业也非常繁荣,除了有规模宏大的都市商业,还有勾通内外的边境贸易。

(2) 山西的文化状况

隋唐宋元数百年间是山西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

哲学领域,隋代大儒王通开创隋唐儒学革新的先河。史学界,唐代裴矩著有《西域图记》,温大雅著有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;宋代史学巨匠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更是千古传世之作。文学领域,唐代王勃、王翰、王之涣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温庭筠等诗人留下无数引领风骚的诗篇;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则与韩愈一道领导了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;金代文豪元好问则集史学、文学大家于一身,其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曲作均享誉一时;元杂居四大家中,山西人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独占其三。与此同时,山西的石窟、彩塑、建筑壁画等也是成就斐然,多为传世珍品。

(二) 隋唐宋元山西方志总貌

隋唐宋元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,以及山西经济、文化的兴盛,山西方志事业得到空前发展。据统计,这一时期有文献可考的方志总量已有 40 余部,较汉魏之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,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志书大都散佚。

1. 隋唐山西方志

隋祚较短,仅存七十余年,从现有文献记载中尚未发现有确切的山西方志记录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地类及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第四地理类中著录有《并州入朝道里记》一卷、《并州总管内诸州图》一卷。这两部书虽不系地记、地图经一类的方志文献,但属隋朝编修图经之时的作品。因此,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看作隋代山西修撰图经的发端,或图经的前期产品。并可据此推断,在当时朝廷下令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情况下,山西也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图经。隋朝李播所撰《方志图经》,今存佚文 18 条,此书虽范围不一定仅限山西,但可视为当时山西产生图经的例证。

《并州入朝道里记》一卷,由隋代荆州江陵(今属湖北)人蔡允恭撰,允恭官起居舍人。本书约于南宋年亡佚。

《并州诸总管内诸州图》一卷,隋代作,撰人不详。约于南宋末季亡佚。

唐代山西方志数量大增,据李裕民、刘纬毅二位现代学者考证,已发现有 14 部:

《两河记》唐代人著。《太平御览》引其文一条。

《河东图》唐人所作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征引一条。

《河东记》唐人著。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寰宇记》征引。

《并州记》唐人所作。《太平御览》引其文一条。

《羊头山记》唐人所著。

《晋阳事迹杂记》十四卷，唐大中八年(854)河东节度使李璋撰。

《太原故事》唐代之作，撰者未详。刘纬毅《汉唐方志辑佚》中考证说：“《太平广记引用书目》并载《太原事记》《太原故事》二书，故知《太原故事》非《太原事迹记》之异名”。

《辽州图经》约唐代之作。《太平御览》征引。

《隰州图经》唐代人撰。《太平御览》征引。

《代州图经》唐代之作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征引。

《绛州图经》唐代之作。《太平御览》征引。

《潞州图经》唐人之作。《太平御览》征引。

《岚州图经》唐至五代时所作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征引。

《古清凉传》二卷，唐释慧祥撰。这是山西现存最早的山水志，主要记载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历史状况。

2. 宋元山西方志

宋金元之时，山西方志编修由稳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，方志编修出现一个高峰。这个时期，山西有文献可考的方志已达26部之多：

《河东路图经》一百一十四卷。宋李宗谔、王曾撰，为《祥符州县图经》之一部分。郑樵《通志·文艺略》单独著录。南宋末亡佚。

《并州图经》北宋之作。《永乐大典》引一则。

《太原地记》宋人所撰。

《上党图经》北宋之作。

《汾州图经》北宋之作。

《宪州图经》北宋政和六年(1116)作。

《应州记》金朱弁撰。作于金天会九年(1128)至皇统三年(1143)之间。

《浑源州记》金朱弁撰。

《平晋图经》宋金之作。

《泽州图经》北宋末金初所作。金李俊民《泽州图记》引。

《泽州图记》金代李俊民撰。约成书于蒙古乃马真后元年(1242年)前后。其文约千余字,存于《庄靖集》中。

《阳城图经》金代之作,佚于金末。

《晋阳志》十二卷,金代蔡珪撰。作于金大定年间(1161~1189)。

《河中志》金元时期所撰,撰人不详。《永乐大典》引。

《五台县志》金天会年间(1123~1134)。这是山西方志史上最早以志命名的县志。

《汾西县志》约金元之际修。

《平阳志》约元代修。洪武《平阳志》卷五、卷七征引三条。明初尚存,后佚。

《朔州志》元人所修。康熙《山西通志》引。

《平定州志》元人之作,康熙《山西通志》引。

《代州志》元人之作。康熙《山西通志》引。

《河津县地图记》元王思诚撰。思诚,滋阳(今山东州)人,官监察御史。曾为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。《清一统志》、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均引。

《广清凉传》三卷。宋释延一撰。宋嘉祐五年(1061)刻印。今有《宛委别藏》本、清吴县蒋氏双唐碑馆本、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校注本三种版本。

《续清凉传》二卷。宋张商英撰,商英(1043~1121),字无觉,号无尽居士,四川新津人。今存清光绪蒋氏刊本、山西人民出版社校注本两种版本。

《盐池录》一卷。宋代高聿撰。《中兴馆阁书辑考》卷二著录,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志,约于南宋末亡佚。

《盐池记》金代梁肃撰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经籍记》著录,已佚。

《龙门记》宋代王向弼撰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,已佚。

(三)隋唐宋元山西方志的特点

隋唐宋元时代是山西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,山西省方志经历了由发展到渐趋成熟的划时代进步。这一时期,山西方志呈现出下列特点:一、方志总量大幅度增加,志书编修已在山西全境开展。二、方志体例逐步成型,内容较前代有所扩展,方志名称渐趋统一。三、志书种类更加丰富,出现了一批专志。

1. 方志总量增加,修志覆盖面遍及全省

隋唐宋元诸朝历时6个世纪,其间山西方志修撰一直持续进行。当时山西方志为数很多,现在有据可考的50余部方志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山西方志总量有了大幅度增加,大约是汉魏南北朝时期的10倍,它们成为以后明清时代方志兴盛的坚实基础。

隋唐宋元时代,山西方志的地域分布已遍及全境。从现

在可知的地记、图经、州县志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：

全省性的有隋《并州总管内诸州图》、隋《并州入朝道里记》、唐《河东图》、唐《河东记》、唐《并州记》、唐《两河记》。

属今太原市的有唐《晋阳事迹杂记》、唐《太原故事》、宋《太原地记》、宋《并州图经》、宋至金《平晋图经》、金《晋阳志》。

属今大同市、朔州市的有宋《浑源州记》、宋《应州记》、金至元《应州图经》、元《朔州志》、元《浑源州图经》。

属今阳泉市的有宋《平定州志》。

属今长治市、晋城市的有唐《潞州图经》、唐《羊头山记》、宋《上党图经》、金《泽州图经》、金《泽州图记》、金《阳城图经》。

属今忻州市的有唐《代州图经》、唐《古清凉传》、宋《宪州图经》、宋《广清凉传》、宋《续清凉传》、金《五台县志》、元《代州志》。

属今吕梁地区的有唐《岚州图经》、宋《汾州图经》。

属今晋中市的有唐《辽州图经》。

属今临汾市的有唐《隰州图经》、金元之际《汾西县志》。

属今运城市的有宋《盐池录》、金《盐池记》、宋《龙门记》、金至元《河中志》。

现在山西省所设的 11 个市在当时已全部有了地方志。

2. 方志内容扩展与体例完善

隋唐宋元山西方志的发展与进步还表现在记载内容更加丰富，记述范围愈加扩大，体例臻于成型，名称渐趋统一。

(1) 体例臻于成型